

张国功 著



温情与敬意

一个出版人的编余零墨

尽管时代不同了，大面积的商业化无可抗拒，

很多东西令人欲说还休，

对爱恨交加的编辑出版职业、方正清白的中国汉字以及我们亦悲亦喜的生活，

我们仍抱着这种传统的人生态度。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张国功 著



Wenqing Yu Jingyi

温情与敬意

一个出版人的编余零墨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温情与敬意——一个出版人的编余零墨 / 张国功著.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0.8

ISBN 978-7-80742-986-9

I. ①温… II. ①张… III. ①出版工作—中国—文集 IV. ①G239.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50569 号

出版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阳明路 310 号 邮编 330006

电 话 0791—6895108(发行热线) 0791—6894723(编辑热线)

网 址 <http://www.bhzw.com> E-mail bhz@bhzw.com

书 名 温情与敬意——一个出版人的编余零墨

作 者 张国功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南昌市红星印刷有限公司

厂 址 南昌市民营科技园民营大道 69 号

开 本 880mm×1230mm 1/16

印 张 26.5

字 数 340 千

版 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8.00 元

ISBN 978-7-80742-986-9

赣版权登字:05-2010-5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辑一 出版史论

有所不为方有所为

——从张元济、胡适对商务印书馆的不同抉择看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生 /3

1949 年里的出版家张元济 /15

商务的文化与文化的商务——近期商务印书馆研究一瞥 /28

重新的“发现”——评两部王云五研究专著及其他 /39

忆昔午桥桥上饮——金灿然时代的中华书局编辑部 /47

立足于史料基础的出版文化研究

——评《近代出版人的文化追求——张元济、陆费逵、王云五的文化贡献》/55

由周振甫先生之著述想到的 /66

漫说一些和出版人“庆寿”有关的出版物 /72

贵阳文通书局的历史与启示 /82

新闻出版人的存史意识——从邹韬奋的自传性写作说起 /101

是回忆录,更是启示录——喻建章《我的七十年出版生涯》编余札记 /107

辑二 编辑刍议

- 出版界如何面对学术腐败——编辑群体的文化担当、职业规范与制度建设 /121
- 学术管理的机制缺陷与重建 /143
- 社会转型期编辑群体的价值自审与文化理念 /154
- 论学术图书编辑活动中的引文四题 /167
- 做一个学术图书编辑的理想与困惑 /184
- 当下的文艺图书出版:焦虑与应对 /197
- 90年代以来文学出版业的转型与文学批评的嬗变 /206
- “版本升级”与旧书新出——剖析一种出版潮流 /226
- 一个编辑的困惑与幸福 /237
- 倾听民间书声——当代出版人与民间读书报刊群体良性互动关系之探讨 /241

辑三 编余零墨

- 文人滑稽:表演与游戏——《滑稽诗文》前言 /253
- 紫砂壶畔的人生闲雅——读《紫砂书系》 /263
- 学术与人文——评《国学大师丛书》 /267
- “唯有旧日子带给我们幸福”——《旧踪丛书》感怀 /273
- 晚清人物的世界图景——读《返回现场——晚清人物寻踪》 /278
- 天地间的大聚散——评《易堂寻踪》 /281
- 花落春仍在?——《文史消闲录》编余零墨 /284
- 《鹅湖学术丛书》编辑人语 /289
- 学术研究机构与现代学术之建立
——读《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大研究所国文学门为中心的探讨》及其他 /293
- 史家的温情与敬意——读《从传统中求变——晚清思想史研究》 /307
- 《清园文存》的出版及其意义 /312



《伟大传统》策划者言	/317
《大家国学·鲁迅》前言	/321
《大家国学·章太炎》前言	/325
政治变局中的生命离歌与文化乡愁——读《移居台湾的九大师》	/334
一个中国人童年里的文化记忆——读蒋彝《儿时琐忆》	/338
这片土地上还有多少旧踪需要追寻?!——蒋彝《儿时琐忆》编余零墨	/343
在《欧阳祖经诗词集》首发式上的发言	/346
从《庚子秋词》到《晓月词》——《欧阳祖经诗词集》编余零墨	/352
十载搜罗成佳构——评《胡先骕先生年谱长编》	/356
什么样的凯歌?为什么悲壮?	
——谈闻一《凯歌悲壮》——一个历史学家眼中的俄罗斯	/363
以史事为镜鉴 寄深思于趣墨——读《文牍趣话》	/366
群星璀璨的汇聚与展示——评《当代微型小说新锐精品方阵》	/369
刘绪源《见山是山 见水是水》编余零墨	/372
从游之乐——《现实与虚构——文学与社会、民俗研究》编后礼记	/376
人生心事纸上痕——《漂泊的心》编后	/379
真性情与大境界——读刘浩元散文	/381
《蔚蓝色的过渡》编后	/385
从历史的深处到现实的地表——读《惊涛裂岸》	/389
阅读率焦虑症、民间书声及其他——《文笔》2008年夏之卷卷首语	/393
文之脉——《文笔》2009年冬之卷卷首语	/395
两位人物,一个难题——《文笔》2010年春之卷卷首语	/398
写着,幸福着——《童话》代后记	/400
平易其文 赤子其人——公仲先生著述编后零墨	/402
让生命自在清和——廖晓明《安顿此心》序	/411
后记	/414

词

理。秉承恩命，不次超迁，俸禄并加。求，疾疫在躬，尤虞貽误。窃维量而后入之义，深蒙奏开缺”。这明显是托辞。期间他在与京中友人的信中谈者志在利禄，所谓国家思想涉渺无所知。若辈在官，安能与之共知。无裨，而虚与委蛇，问世问心，能不自疚！……既出为国家任事，一无事权，身在局中而坐视其日就败坏，无术挽救，则不知不在其位，犹少安也。”（1907年5月致林绍年札）这种直指官场弊病的文字无异是一纸与官场诀别的宣言。1913年（民国二年），北京政府总理熊希龄阁，有意邀请已经是商务董事的张元济任教育总长。张元济在复熊信承认，在自己的心目中，“吾国民若不亟施以教育，后此将何望也……无论从何方面着想，终不能不从教育入手……教育……也……虽十多年来完全停废，但……”

（张元济致
邮传部札，
署日期）

温情与敬意

一个出版人的编余零墨

辑一 出版史论

有所不为方有所为

1949年里的出版家张元济

商务的文化与文化的商务

重新“发现”

贵阳文通书局的历史与启示

……



有所不为方有所为

——从张元济、胡适对商务印书馆的不同抉择看现代知识分子的人生

一

自晚清以来的近代社会,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无疑迎来了一片前所未有的开阔自由的生存空间:封建王朝的宫墙终于在革命的炮声中轰毁坍塌,传统文人的视野开始有机会从狭窄逼仄的庙堂转向自由得多的社会江湖。朝廷与帝王不再是知识分子单一的合法使用者与购买者,而发育日渐成熟的现代市民社会,为他们提供了更好地施展自身才华的新式公共空间。一向是作为封建官僚后备队伍而萎缩于单质化生存状态的旧式文人群体,逐渐从拥挤的仕途上游离出来,开始筹划兴办新学、创立报馆书局、翻译西籍、发展实业……这样一个王纲解纽政权松散的时代,对于平民百姓来说当然是生活的乱世,但对于一向被禁锢在窒息沉闷的封建牢笼中的知识分子群体来说,却可能意味着是一个风云际会、鸢飞鱼跃的百家争鸣的时代。这个伟大的时代所焕发出的激情与创造力,为一代知识分子提供了许多呼吸视听的新通道,推动着他们的人生偏离了既往的传统轨迹,使他们的人生绽放出了迥异于前辈知识分子的夺目光彩。

但话又得说回来,外在的社会环境毕竟只是为个人的发展提供了一种可能。如何使个人在变幻的大时代浪潮中把握好自己,最终还是要取决于个人的主动抉择。20世纪初(或者说“五四”前后)的一代知

识分子之所以在后人的记忆中,总有抹不去的阔大宏伟的人生气象和非凡的人格魅力,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这一群体清醒而理性的人生抉择所演绎出的精彩人生。在世纪之初的地平线上,新式的新闻出版业日益扩展、成熟,成为一种思想家丁·哈贝马斯所说的“公共领域”,为一代知识分子和公众提供了一个宽阔的平台。从张元济与胡适这两位著名知识分子对待现代出版产业——具体地说,是对中国现代出版业的代表性、奠基性机构商务印书馆——的不同选择来看,就很可以得出在个人与时代之间关系这一问题上的一丝启示来。

二

1898年,在维新变法的潮流下,京师大学堂成立,这就是北京大学的前身。当时的管理大学堂事务大臣是朝中名臣、“帝党”人物孙家鼐,他看中了在维新运动中崭露头角的青年才俊张元济的才华,就极力邀请张出任大学堂总办一职。总办大体相当于今天的教务长,这在“咸与维新”、动辄以创办新学为时髦的人看来,也算是一个求之不得的好位置了。更何况,张元济一向以开启民智为最大抱负,以热心扶助新学教育为当然己任,并且因致力于创办通艺学堂等新式教育而早已名声颇著,但当时却不得不困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的职位上无聊度日。对于这种情形下的他说来,京师大学堂总办的位置,更可谓是一次实现平生理想、一试身手的绝好机遇。但张元济却毫不犹豫地谢绝了孙家鼐的邀请。张元济这位前清的翰林,在激荡时代大潮的淘洗中敏锐觉悟、与时俱进,此时已经逐渐拥有了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的远见卓识。在总理衙门任章京的不长时间内,衙门内的官僚作风就已经使张元济深深地意识到了封建末世的官办机构的不可合作、无可救药之处。早在1896年,正孜孜不倦地学习西文的张元济,对朝廷封杀强学会书局、杜绝言路的专制做法极为不满,为此他曾特意上书于时任管学大臣的孙家鼐,结果是“曾有书上之,后屡谒而不得一见。观其行事,亦终难扫除朝贵习气”(1896年6月8日张元济致汪康年



札)。刚进入总理衙门官署时,张元济就隐隐担忧,说:“深恐一入樊笼,将来必成废朽……”(1896年11月19日致汪康年札)这一回,当孙家鼐邀请张元济加盟大学堂时,张就不再对官场办学这一沽名钓誉行为稍感兴趣、抱一线希望了。1898年7月的《国闻报》上说,大学堂总办是兼差,张元济认为学堂各员应该一律开去本衙门差使及兼差,以便一心一意专办学堂。孙家鼐不同意此举,张元济就果断地拒绝了孙的邀请——丢不下官员的身份,而只是在留恋官位的同时追逐办学堂的热衷以便获得一个维新的好名声,这是张元济所坚决不同意的。他在私下给汪康年的又一封信中说:“大学堂事寿州(即孙家鼐)派弟充总办,业已奏准。因其所用之人多非同志,极力辞退。此事亦恐变为官事,步官书局之后尘。可叹!可叹!”(1898年7月27日致汪康年札)汪康年与张元济为同科乡试举人,皆为新派人物,两人互为知音。张对汪所说之私语自然是真心之言。可以看出,数年沉浮郎署而终无所成的无聊经历,使敏感的张元济对封建官场行事之陋习弊端已是多有领教,对于无所成效而徒耗华年的官场,他早已萌生疏离之心,而维护思想独立、以实业救国的信念逐渐在他的头脑中孕育成形了。

在19世纪的最后一年,张元济从政治旋涡中心北京撤离,南下来到了新兴的口岸城市上海——这是他由官向绅、从庙堂走向民间的重要转折点。在近现代史上,知识分子有着三次因社会动荡而引发的群体性大迁移,他们的迁移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当时的文化格局。第一次即是因为戊戌变法的失败,导致以张元济、蔡元培等维新派文人精英南旋,开始疏离清政府。每一次知识分子群体的迁移,就带来当时的文化生态某一方面的变化。对于出版业而言,这次迁移间接导致了商务印书馆从印刷作坊到现代出版重镇的质变与跃起。1901年,张元济走进官办商捐的南洋公学,担任南洋译书院院长之职,倾力埋首于自己心仪的翻译事业,颇为见重于当时长袖善舞的头面人物、南洋公学的创办者盛宣怀。但他很快就对这种栖身官办机构、事业“无可展布”的状况产生了不满。1902年,当排字工人出身、只有普通中学文化

程度、还是一个小型家庭式印刷作坊的小老板夏瑞芳斗胆冒昧邀请张元济加盟商务印书馆时,张却在对方的勤勉务实作风与民间文化实业的巨大空间中,深刻地洞察出了自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真正的安身立命之处,一下子就认可了这桩“双向选择”,与几个创办商务的职业工人意气相投,毫不犹豫地于次年辞却了译书院的一切“公家人”的位置,而入股商务,出掌商务编译所。一个体面荣光的堂堂进士、前清翰林,脱下了自己身上的一袭象征着显贵等级的翰林长袍,而弯腰走入弥漫着油墨味、充塞着嘈杂声的印刷作坊之中,与一群出身低微的排字工人走到了一起。在深入人心的功名意识仍是主流观念的时代,这真可谓是一道别样特出的新奇风景,是需要足够的勇气与睿识的。

事实上当时的张元济已经完全坚定了远离宦海仕途的决心,这从他日后一再拒绝政治的相招就可以看得出来。1904年,汪康年转告说外务部尚书、军机大臣瞿鸿禨有意保举张元济出任外务部职事。张在回信中明确告诉老友:“若复旅进旅退,但图侥幸一官,则非所以自待。”他还说自己现在在商务忙于编撰小学教科书,“自谓可尽我国民义务。平心思之,视浮沉郎署,终日作纸上空谈者,不可谓不高出一层也”(1904年8月14日致汪康年札)。——在民间勤勉创业而不是在官衙消磨时光,这种生活很是给张元济一种踏实的人生感觉。1907年,邮传部尚书岑春煊保举张元济为邮传部丞参上行走,三次电召他入署,张两次电辞。他表面的理由是养病,他说自己接到上谕,“跪诵之余,莫名惊悚。伏念元济备员外(务)部,陨越时虞。去岁呈请备资出洋,藉扩闻见。行抵上海,猝婴脑疾,正在就医调理。渥承恩命,不次超迁,悚惧并交,恐难报称。兼之轮路邮电诸政夙未讲求,疾疚在躬,尤虞贻误。窃维量而后入之义,深慊信斯未能之怀,伏乞代奏开缺”(张元济致邮传部札,未署日期)。这明显是托词。期间他在与京中友人的信中谈到此事时说:“来者志在利禄,所谓国家思想渺无所知。若辈在官,安能与之共事!……明知于事无裨,而虚与委蛇,问世问心,能不自疚!……既出为国家任事,而又一无事权,身在局中而坐视其日就败



坏,无术挽救,则不如不在其位,心犹少安也。”(1907年5月致林绍年札)这种直指官场弊病的文字无异于是一纸与官场诀别的宣言。1913年(民国二年),北京政府总理熊希龄组阁,有意邀请已经是商务董事的张元济任教育总长。张元济在复熊信中承认,在自己的心目中,“吾国民若不亟施以教育,后此将何颜立于世界?……无论从何方面着想,终不能不从教育入手……教育则根本中之根本也……虽十余年来未尝舍此他事”,但他又说“自维庸劣,终不敢误我良友、误我国家,并误我可畏之后生”(民国二年9月12日致熊希龄札),而最终谢绝了熊的延揽。“自维庸劣”显然是托词——对暮气沉沉的官场的极度不信任,对正在向知识分子显示出广阔天地的现代民间公共空间的由衷喜悦,才是张几次拒绝再入政治激流中心而自甘退居社会边缘的深层原因。在做事还是做官这一别人看来根本毋庸考虑权衡的问题上,作为由旧向新过渡的一介知识分子,张元济的思考远远地超越了那些思想尾巴还滞留在传统境地的同时代人。这种由仕进而实业的思想,并非张元济所独有,而是戊戌后诸多知识分子的普遍心态;从心向庙堂而转向更为开阔沉实的民间,是当时知识分子的普遍选择。如蔡元培,自此之后即知清廷不足与谋,因此请长假回故乡绍兴办教育,充任中西学堂校长。而严复,此后则专心以翻译为业,充当思想“二传手”。他在1899年给张元济的信中说:“弟近灰心仕进。……自客秋以来,仰观天时,俯察人事,但觉守旧维新,两无一可。即使朝廷今日不行一事,抑所为皆非,但令在野之人与夫后生英俊洞识中西实情者日多一日,则炎黄种类未必遂至沦胥;即不幸暂被羁縻,亦将有复苏之一日也。所以屏弃万缘,惟以译书自课。……此后正可不问他事,专心译书以饷一世。”由于在深思熟虑后得出的以出版推动教育、开启民智的理想信念,使张元济轻松而果决地放下了一个传统翰林的架子与面子,而与一群有着务实精神的下层工人为伍,联手开创出了一番的不朽事业。“自是厥后,商务印书馆始一改面目,由以印刷为主,进而为出版事业。其成为我国历史最长之大出版家,实始于张君之加入。”(王云五《商务

三

与张元济投身现代出版业的人生抉择相反的,是和他平生风谊师兼友的胡适:他毅然抵制了现代出版业迷人的相招。

1921年,新文化运动已经进入了高潮时期。当时已经成为中国出版界龙头老大并且是亚洲最大出版机构的商务印书馆,走到了它的一个关键性的发展时期,经受着前所未有的冲击与挑战,馆里的高层领导迫切感觉到自身跟不上蓬勃发展的新文化潮流,明显感受到来自北京、以《新青年》与《新潮》同人杂志为代表的激进文化力量的指责与压力,而力图改变商务稳重有余、趋新不足的惯常形象。当时身任编译所所长的高梦旦认为时局日益革新,编译工作应适应潮流,站在前线,而自己“自审不适于新潮流”,“不适于编译所所长,当为公司觅一适于此职之人以自代”(庄俞《悼梦旦高公》)。他主动急流勇退,开始谋求一位能够顺应时代形势、更具号召力的人物来代替自己。

商务把目标瞄准了正处在新文化运动浪头上的名人胡适。胡适留学美国,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之一,但思想并不激进而有温和开明之风,不至于使商务倏然走上极端,当然是主持商务编辑业务的最佳人选。当年4月,高梦旦亲赴北京,几次力劝胡适辞去北京大学之事而到商务主持编译所。高坦诚地说自己不能胜任,故要胡去“帮他的忙”。高梦旦说得极为客气:“我们那边缺少一个眼睛,我们盼望你来做我们的眼睛。”(胡适4月27日日记)这种出自一个商务领导者口中的话语,分明流露出求贤若渴的至诚之意。起初胡适几次婉谢了。他说:“我决不会看不起商务印书馆的工作。一个支配几千万儿童的知识思想的机关,当然比北京大学重要多了。我所虑的只是怕我自己干不了这件事。”看到胡适实在不答应,高梦旦又退而求其次,提出了一个不得已的调停办法,邀请胡适“到上海去玩三个月,做他们的客人,替他们看看他们的办事情形,和他们的人物谈谈”,帮商务出谋划策,指导



一下工作如何开创新局面。一向忠厚的高梦旦这次带着半诳骗的口气劝说胡适将家眷一起带来,想以此将胡适“拖留”在上海。胡适最终没有“中计”。在这年暑假,胡适只身一人南下。抵沪时,张元济、高梦旦、李拔可等商务要人都亲自到车站相候。这种隆重的礼遇在沪上引起了极大的轰动效应。当时的《商报》还在一篇名叫《胡老板登台记》的花边新闻中将此种情形大大炒作了一番,说是“北京大学赫赫有名的哲学教员,新文学的泰斗胡适之,应商务印书馆高所长的特聘来沪主撰,言明薪金五千元(比大总统舒服)。高所长亲自北京迎来,所有川资膳宿,悉由该馆担任。今日为到馆第一天,该馆扫径结彩,总理以次,均迎自门首……所长、部长及各科主任,趋侍恐后,方之省长接任,有过之而无不及……简直同剧界大王梅兰芳受天蟾舞台的聘第一日登台一样”。胡适在上海张元济的居所对面住了一个暑假,轮流与商务编译所的各部高级编辑和各杂志主编等人进行沟通交流,并以自己的看法对商务的经营发展提出了一大堆意见,写出了详细的考察报告。最后,考虑来考虑去,他还是没有留在商务上演自己的好戏,而是推荐了他的旧年老师王云五代替自己。——由于胡适的举师自代,王云五后来在商务别开新局,留下了一段佳话,这当然是后话了。

要说起来,风云际会、长袖善舞的胡适当时自然知道商务印书馆在现代新文化建设进程中的重要性。刚从国外回来时一切以美国为观察国内事情标准的胡适,一度对国内的出版界状况十分失望,但不久他就对商务刮目相看。他在4月27日的日记中写道:“此事的重要,我是承认的:得着一个商务印书馆,比得着什么学校更重要。”胡适对商务的文化影响力,是确信无疑的。更何况,从经济上比较,商务与胡适所在的北大当时可谓是形同天壤之别。商务经济雄厚,而当时包括北大在内的高校多已欠薪数月,甚至发生索薪风潮,政府与高校的关系极为紧张,教职工亦人人心思迁。当年正在商务主编《小说月报》的茅盾,事后就在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中揣测过,不排除胡适当时对商务有点动心,因为论薪水商务编译所所长比大学教授高出数倍,论权

力也比大学文学院院长大得多,又可以“网罗海内人才,或抛出夹袋中物”。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胡适此前停写日记十年,至1921年4月27日才恢复,其开笔记录的就是关于商务邀请他加盟一事,可见他对此事的看重。但胡适考虑的是:“但我是三十岁的人,我还有自己的事业要做,我自己至少要做十年二十年自己的事业,况且我自己相信不是一个没有可以贡献的能力的人。因此,我几次婉言谢绝了他……”当商务决策层再次向他提出要他留下时,他又考虑:“这个编译所确是很要紧的一个教育机关,——一种教育大势力。我现在所以迟疑,只因为我是三十岁的人,不应该放弃自己的事,去办那完全为人的事”(8月13日日记)——把商务看做是“一种教育大势力”,与张元济把教育看做是“根本之根本”的信念,何其相似!但在胡适的心目中,做编辑出版事业始终有点“完全为人的事”的味道。以他不甘人后的个性而言,他从来就没有把自己定位为一个“为他人做嫁衣裳”的幕后人物,而是主张慷慨自任,追求让自己成为一个领衔时代风尚的学者与思想人物。更何况,他所在的是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胡适在日记中说过:“我走到南方,才知道现在中国止有一个北京大学可以大有为,弃了真可惜。”

在早年,胡适曾经说过自己“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他想做的事情是以自己的著述去引导大众,开启众智。待在上海的7月27日晚,他被邀请与郑振铎、胡愈之、沈雁冰等人在高梦旦家中聚餐。席间商务编译所东文部主任郑贞文说:“一个学者在商务编译所久了,不但没有长进,而且从此毁了。”胡适对这番话显然是心有戚戚焉,特意在当日的日记中郑重地记了下来,还提出了派人留学、创办图书馆等四条避免这种危险的意见。当时,在胡适的心中,学问无疑才是他“自己的事业”和第一选择。更何况,当时他已经是在学界与文化界登高一呼辄从者云集的风云人物了。这位北大的名教授,此时正处在新文化运动的关键转型期之中。面对《新青年》从思想文化类刊物向社会政治类刊物的转折变化,他还想重新另起炉灶,继续自己的文化思想革命之路;他还



刚开始过起“整理国故”的学术之瘾,对《红楼梦》、《章氏遗书》、《水浒传》之类的考证以及《读书杂志》、《国故丛书》等的编选,兴趣犹浓;年纪轻轻,他就有资格开始选编《胡适文存》了;他还忙于欢迎哲学家杜威,将他的“实验主义”引进……“文章千古事”,刚过而立之年的胡适,正为自己前途无量的学术事业奔忙,一切都围着这个中心展开。至于其他的,都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比如说,当时已经离开北大的陈独秀将信寄到上海,邀请胡适回故乡安徽任教育厅厅长,胡适也敬谢了(见胡适8月27日日记)。

在后来的岁月中,胡适尽管涉足政治,甚至被“拉夫”客串了一下“玩票性质”的驻美大使,但他对学问的一往情深仍是丝毫不减。在离开商务的次年(1922),胡适筹办了《努力周报》,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张元济等好友担心他成为“梁任公之续”而劝他“专心著书,那是上策”。胡适在日记中特意记下这段话,还将“著书为上”四字写下送人共勉。1947年蒋介石希望胡适以大学校长的身份去美国访问,以为渐渐失去美国信任的国民党政府挽回一些信任;还想让胡适参加总统竞选,以造成民主的假象。胡适为此事特意去了一趟南京。返回时他给旧友、外交部长王世杰写了一封信说明自己不愿再去做大使的原因:一是刚刚受命办一个学校,还未见成效,就中途改辙,对不起国家、学校与自己;二是“我今年57岁了,此时若改行,便是永远抛弃学术的事业了。这是不是一件大损失。至少我有点不甘心”;三是自1942年后自己全力“理旧业”,五年不注意国内外形势,实已是外行了,一时不容易恢复从前的自信力。末了他又特意注明:“此三点之中,第二点最要。”——即使如此世事纷扰,他还是牵挂着自己的学术。时代的动荡,固然使胡适常常扮演多样的社会角色,但终其本真底色,他毕竟是一介学人。

事实上,到了1936年,胡适为故去的高梦旦先生写《小传》时,旧事重提,他就将自己不愿就职于商务的缘由和盘托出了:“我研究的结果,我始终承认我的性情和训练都不配做这件事。”——这句谦逊话的